

从“语文课”引向“语文生活”



今年秋季开始,依据新课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“部编本”语文新版教材即将投入使用。经过十多年的探索,课改的成果终于凝结成形。回顾这些年语文教学改革的历程,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明确了“语文素养”这一核心概念。

课标确定的“语文素养”是什么呢?它意味着,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综合考虑学生的“听说读写”等语文“能力”,还要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,要考虑,通过语文学习提高文学、文章等学识修养,还有文风、情趣等人格修养。

广大一线教师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语文素养”在教学实践中如何体现?“语文课”不那样教,该怎样教?其实,这一疑难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眼光太聚焦于语文“课”,而真正的解答是,“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”,通过课上的引导,让学生在课下自主阅读,大量阅读,去感受,思考,接受熏陶,表达自我——总之,在丰富多彩的“语文生活”里成长,这可能才是语文真正应有的样子。

可惜的是,“语文生活”的核心内容——阅读,这十多年来,产生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尖锐。青少年自主阅读的时间和阅读量很难得到保证,阅读质量也令人担忧,碎片化的、快餐式的阅读比重上升,而经典作品的阅读、“深度阅读”则表现出滑坡。我们似乎正在养成一代不再喜爱阅读、尊重经典的国民。这一问题的成因很多,很可能也不是语文教学能独力解决的。尽管如此,努力从课堂向课外延伸,让学生不仅有语文课,更有“语文

生活”,是语文教学的分内之言。

语文本来是应该能养成学生的阅读兴趣的,可是情况恰恰相反。学生中有一句口头禅:“一怕文言文,二怕写作文,三怕周树人。”为什么面对凝聚着传统文化精华的文言篇章、蕴涵着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鲁迅作品,学生不仅缺乏兴趣,而且会感到“怕”?原因是,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并没有体会到文章之美,当只是面对着被琐细分析拆解开的零散“知识点”,他们怎么能不“怕”呢?像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社戏》这样充满浓郁抒情美感的名篇,还有《世说新语》的小品、《史记》的精彩叙事,如果只成为训练“技能”的材料,那多么可惜!应当改变这种教学方式,避免败坏学生的阅读兴趣,珍视学生的个性化阅读,珍视其中飞扬的灵性和兴味。如果语文课能让学生从作品中感受到魅力,真正激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,那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关键的任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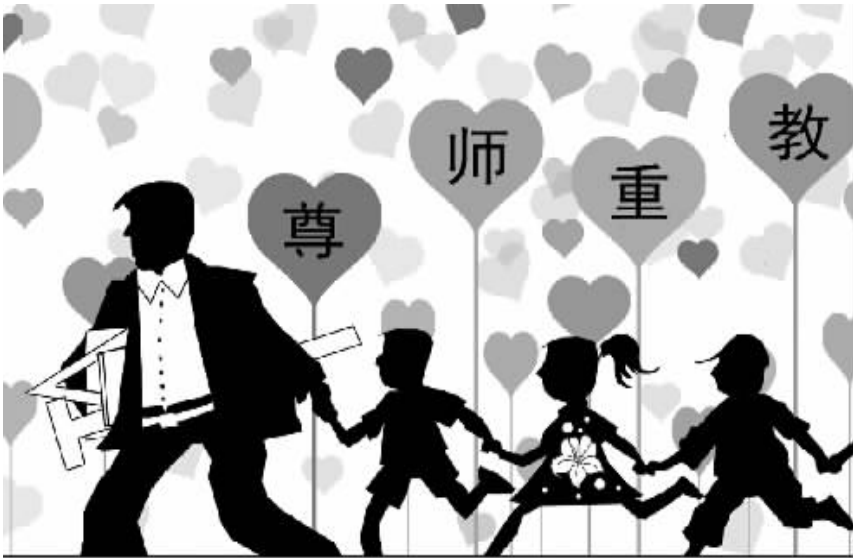
语文课应该努力成为学生阅读的导引。以前习惯区分“精”读和“略”读,但在实际中,两种课型的区别往往很模糊,应该提倡将不同课文的区别明晰化,从精读、略读,推进为“教”读和“自”读,更自觉地促进学生的自主阅读。不仅如此,还要让语文向课外延伸,既教给学生多样化的阅读方法,也为他们提供课外阅读的线索导引。如果我们能构建一个从“教读”到“自读”再到“课外阅读”的“三位一体”,学生的阅读状况必将有显著的改善。

提倡从“语文课”到“语文生活”,提倡引导学生多读书、读好书,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“语文”的问题。让青少年在中小学阶段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,形成一种终身受益的生活方式,指向的其实是教育的根本任务——“立人”,这正是“语文素养”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花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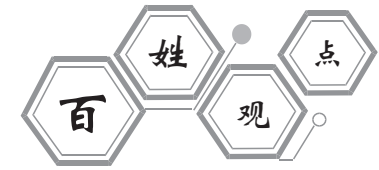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,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,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。

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,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,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,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

新华社发

骚扰电话该谁管



■志明

最近,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:“每天叫醒我的,不是闹钟,也不是梦想,而是骚扰电话。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,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:

“先生你好,最近我们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理财产品,会考虑吗?”

“我这儿有明细的正规发票,需要不?”

“女士,请问您最近考虑买房或租房吗?”

……

理财推销、发票开具、中奖兑换、房屋租赁、辅导培训,骚扰电话五花八门,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,让人感觉“接不完,不胜烦”。

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?今年3月,百度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络安全白皮书》显示,2015年,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,较2014年上涨57%。这么大的数量,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,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。最不可思议的是,很多人手机上显示,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被打,岂非咄咄怪事?

客观地看,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。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+电话为例,除非含有色情、暴力、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,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、哪些内容属诈骗。更有人认为,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,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,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。这种似是而非的“付费就能使用论”,好像有一定道理,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。对每年数以几

百亿计的骚扰电话,难道只能听之任之?

据知情人透露,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,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。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,既能批量外呼,还能语音自动群呼,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,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;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,滥用遗传技术,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,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,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。有媒体报道,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,每通话一分钟,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。

打击骚扰电话,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。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,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,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,清除内部害群之马。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,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,在电信号源、号码发放、资质审核、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。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,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,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,让相关软件更有效。

打击骚扰电话,需要创新监管方式,加大处罚力度。在这方面,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。比如,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,为电信用户申请“别打我电话”服务,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“全国别打电话名录”,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,将被处以1.1万美元的罚款。德国法律规定,乱打骚扰电话者,将根据情节,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,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。

这几年,为打击骚扰电话,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“清网行动”,查处了不少伪基站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,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。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,工信、工商、金融、公安等相关部门也应建立应急协调机制,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,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,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。

院士头衔不是“铁帽子”



言者有意

■彭飞

让人闻之肃然起敬的院士称号,将不再是一项“铁帽子”。根据中国科学院最新修订的《中国科学院章程》,不仅院士有权放弃院士称号,而且当院士出现严重违法科学道德、品行严重不端、触犯国家法律等行为时,院方将劝其放弃甚至撤销院士称号。

长久以来,院士退出机制的不完善屡遭诟病,出现了一些“退不出”“去不掉”的情况,让院士头衔如同“铁帽子”,无论好坏都跟一辈子。其中的无奈,正反映了我国院士制度在人才培养、代际更替、人员流动方面存在的不足。而此次从“自退”到“劝退”再到“强退”,正形成了一套日趋成熟的院士退出机制。这套规定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就已落定,如今上升为全院“章程”,其重要性自不必言,有助于在具体实施上驶入快车道。

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曾说:“我38岁,站在研究的最前沿,却是无名小卒;58岁时,成为两院院士,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;到现在68岁,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,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,靠虚

名过日子。”这段轻描淡写的人生经历,恰恰反映了我国院士称号与实际学术成就之间的不平衡、不对等。天平上,一边是院士头衔的实际归属,一边是科学家的实际成果和影响力。天平倾斜,破坏的不单是最普遍的社会期待,更是我国科技人才生长发育的制度土壤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在使院士的头衔偏离学术正轨,走向形形色色的名利场。学术会议少了院士,好像就“面上无光”;科研院所少了院士,好像就“不够分量”;成果鉴定少了院士,好像就要“走走过场”。这种略显盲目的“院士崇拜”,正揭示出院士头衔的异化现象。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。当“院士头衔”脱离了它所赖以生存的学术研究,也就丧失了其最核心的价值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使院士制度更加完善,真正守住学术性、荣誉性的本质。院士制度是一项激励科学研究工作者砥砺前行的国家荣誉,科学家只有扎扎实实搞研究,端端正正做学问,才能配得上这份荣誉,也才能发挥这荣誉的最大效用。正因如此,才有必要建立更加公平、合理的院士进入和退出机制,完善我国科技人才流动、代际更替的相关制度安排,让有高素质、有能力的人“上得去”,让不符合条件、水平低的人“下得来”。相信有关制度的出台和落实,能更有效保障院士称号“名副其实”,去除附着于学术评价体系之上的名和利。